



教研相长七书

JIAO YAN XIANG ZHANG QI SHU

行龙◎著

山西区域社会史十五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第1讲



教研相长七书

山西区域社会史十五讲

JIAOYAN XIANGCHANG QISHU

行龙◎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山西区域社会史十五讲 / 行龙著. —北京: 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3

ISBN 978 - 7 - 5203 - 2298 - 0

I. ①山… II. ①行… III. ①社会史—山西—文集
IV. ①K292.5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58871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王莎莎
责任校对 张爱华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7.75
插 页 2
字 数 278 千字
定 价 7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教研相长七书”总序

“教学相长”，可谓耳熟能详。《礼记·学记》谓：“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这里所说的“教研相长”，则是强调教学和研究的互相促进，互相提高。教学和研究，两者融为一体，相得益彰，那是一个大学教师应该感到很欣慰的事情。

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成立 20 多年来，秉持教研相长的优良传统，一直强调在做好科学研究的同时，做好本科和研究生的教学工作。既要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融入教学实践中，又要把教学实践中的问题引入自己的科学研究中，由“知不足”“知困”，到“自反”“自强”，确实朝着“教研相长”的方向不断努力。

2008 年 5 月，在山西大学举行的建校 106 周年纪念活动中，我在大会上有一个发言，题目叫作“走向田野与社会的史学”，初步总结了社会史研究中心成立以来立足前沿、学科融合、关注现实、培养人才、教研相长五个方面所谓的“经验之谈”。其中的“教研相长”如此谈道：

教师的天职是教书育人，传道、授业、解惑即为师之本。目前，高校普遍存在的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是重科研而轻教学，它与不合理的各种考核和晋升条件有直接的关联，也与社会风气的影响直接相关。我记得，1985 年留校任教后，乔志强先生曾和我有过一次认真的谈话，主题就是讲教学是教师的第一要务，站不稳三尺讲台，就没有立身之本，青年教师要把过好教学关当作工作后的第一关去认真对待，不得丝毫马虎。三十年来，我一直把老师的忠告铭记心间，即使在最近这些年繁重的行政工作压力下，我也尽量给本科生

上课，争取上好每一节课。对自己的学生我也如此要求，尽管可能会累一点，但我们作为一个教师，心里实在有一种良心上的满足感。目前，由我带头的《区域社会史研究导论》课程已成为国家优秀精品课程，团队也获得国家优秀教学团队的荣誉。我们还以精品课程为核心，开展了“校园历史文化节”“鉴知精品课程青年教师培训班”两项活动，有关的教材也在积极的编写过程中。事实证明，通过高质量的教学活动，大大促进了科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教研相长绝非空词。

“教研相长”是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成立以来的一个好传统。乔志强先生在世时，不仅开拓性地率先开展社会史的研究，而且带领众弟子编写《中国近代社会史》一书，以此获得了教育部优秀教学成果奖，成为至今许多高校本科生、研究生的必读书和教材。乔先生仙逝后，我们又继承和发扬这一传统，虽然将研究的重心由整体社会史转向区域社会史，但教研相长却一以贯之，努力以赴。围绕 10 多年前为本科生开设的《区域社会史研究导论》课程，我们组建了“区域社会史”教学团队，获得了国家精品课程、视频公开课、优秀教学团队等荣誉，山西大学历史学科以此成为国家级特色学科，并建立了国家级的校外大学生实践教学基地。2014 年，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被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共同授予“全国教育系统先进单位”的荣誉称号。

毋庸讳言，目前中国高等教育仍然面临着许多挑战和问题，其中重科研轻教学的现象表现比较突出，许多高校的研究机构人员很少甚或没有为本科生上课的教学任务，导致科研与教学的严重脱节。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培养，重课堂学习轻研究训练，已经成为普遍诟病的问题。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不足 10 人，我们既作为研究团队，又作为教学团队，一肩双任，虽苦犹乐，这是因为我们首先是一个大学的老师。在科研和教学的长期实践过程中，我们确实有一份责任感，又有一份快乐感。

“教研相长七书”的一个小小意愿，就是把我們长期以来围绕中国社会史、区域社会史的教学实践公之于世，接受大学生、研究生和社会各界的意见和批评，以便继续深化这方面的工作。

以下就“教研相长七书”分别作以简要的介绍：

一、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该书为乔志强先生“和青年教师的集体尝试”，该书分社会构成、社会生活、社会功能三编建构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知识体系，内容包括人口、家庭、宗族；社区与民族；社层变动；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人际关系；教养功能；控制功能等。有学者称为“乔氏体系，三大板块”。正文之前有乔志强先生撰写的长达35页的“导论”，讨论社会史研究的对象、社会史的知识结构、研究社会史的意义、怎样研究社会史四个问题。这是国内第一本系统的社会史研究著作，有评论认为此书为社会史研究“从理论探讨到实际操作迈出的第一步”，“具有某种划时代的意义”。该书又有台北南天书局1998年6月中文繁体本，已经成为许多大学本科生、研究生的必读教材。

二、行龙主编《区域社会史研究导论》。2004年开始，由我牵头在山西大学历史系开设《区域社会史研究导论》课程，期间，或历史专业选修课，或全校公开课，连续十余年未曾间断。该课程以“集体授课”的形式进行，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的8位教师共同担当本课程的授课任务。2007年，该课程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程，次年区域社会史教学团队被评为国家级优秀教学团队；2013年，该课程作为教育部精品视频公开课向社会开放。授课的同时，我们就在进行着相关教材的编写，结合授课实际和学生的反映，大家一起讨论，反复修订，课程讲授—田野考察—修订教材，不断地循环往复，终于完成了这本经过10余年努力而成的教材。该书共七章一个绪论，讲授区域社会史研究的趋向、学科定位、区域特性、小地方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理论、方法、资料等内容，意在提供给学生一个怎样研究区域社会史的入门教材。

三、行龙主编《近代山西社会研究——走向田野与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本书为“山西大学百年校庆学术丛书”之一种，“是我和近几届硕士研究生共同完成的”。“本书除前面两篇有关社会史及区域社会史的理论问题（行龙：《中国社会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乔志强、行龙：《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论——兼论地域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外，对近代以来山西人口、水资源及水案、灾荒、集市、民教冲突、祁太秧歌等分专题进行了研究。应当说这些问题都是之前很少涉猎

或没有研究过的问题，我们试图从社会史的角度对此进行探讨。”时间过得真快，一晃该书已面世14个年头，昔日的硕士生已成长为大学的教授，我感到很是欣慰。又，正是本书当年的责任编辑郭沂纹先生的肯定和支持，才催生了“教研相长七书”，对此要对她道一声感谢！

四、行龙主编《集体化时代的山西农村社会研究》。此书可以看作前书的姊妹篇，也是社会史研究中心硕士生毕业论文修改而成。集体化时代的农村社会研究，是近年来中心的一个主要研究方向，多篇硕士、博士论文围绕此方向展开。该书所涉内容包括两大类：一类为集体化时代的某个村庄问题的研究，典型农村如西沟、张庄，一般农村如赤桥、剪子湾、道备等；另一类为专题研究，如新区土改、医疗卫生、水土保持、农田水利、文化生活等。需要说明的是，正如前书的副标题一样，各篇论文的形成，都实践和体现了“走向田野与社会”的理念。论文“或以资料翔实见长，或以立题新颖取胜，各位都注意到充分利用田野调查和地方文献，下过一番苦功夫”。现经中心诸位教师讨论，从数十篇中选取十篇结集出版，接受读者的指正与批评。

五、行龙主编、郭永平副主编《在田野中发现历史——学生田野调查报告（永济篇）》。走向田野与社会，是我们多年来从事社会史和区域社会史教研工作中的追求与实践。“这里的田野包含两层意思：一是相对于校园和图书馆的田地与原野，也就是基层社会和农村；二是人类学意义上的田野工作，也就是参与观察实地考察的方法；这里的社会也有两层含义：一是现实的社会，我们必须关注现实社会，懂得从现在推延到过去或者由过去推延到现在；二是社会史意义上的社会，这是一个整体的社会，一个‘自下而上’的社会。”^①田野工作是中心和历史学专业每一届学生的必修课，多年来，我们一直坚持这一做法，学生收获良多。

位于山西省南部的永济，是我们与永济市人民政府共同建立的国家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基地，近年来，山西大学社会史研究中心的教师结合《区域社会史研究导论》课程讲授，带领学生在永济进行了多次田野考察，该书收录的学生作品含学术论文、调查报告、田野日记三部分。

^① 行龙：《走向田野与社会》（修订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19页。

虽显稚嫩，但对我们而言却十分重要，因为这是多年来学生田野工作的一次集中展现。

六、行龙著《山西区域社会史十五讲》。该书从我近年来发表的数十篇有关山西区域社会史的论文中辑出。书分六部分内容，涉及山西区域社会史研究的主要脉络，新的研究领域、田野考察、资料发掘、人物研究及山西大学校史的相关问题。这些论文都是在教学过程中“初次亮相”，进而吸收各方意见成稿，也可以说是本人“教研相长”的成果。

七、胡英泽、张俊峰主编《区域社会史研究读本》。这个“读本”，或可叫做“选本”，也就是一个教学参考书。记得我们读大学的时候，有一门课程是“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很受学生欢迎。区域社会史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30年来却有那么多的成果出现，既要选的精当，又要使学生爱读，既要有理论方法的引导意义，又要兼顾具体的实践操作，实在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又，这个读本只收录了部分中国学者的作品，限于篇幅未能收录海外学者的作品（有机会可再编一本《海外读本》），意在使读者减少隔膜感而增进亲近感，这样的初衷或许更符合读者的口味。“学识有限，难免挂一漏万，留遗珠之憾”，并非一句客套话。

“教研相长七书”编订之际，既有一分欣慰，又有一分忐忑。我们在长期从事历史研究的过程中，认真地从事了相关的教学工作，从大家的谈论中，从学生的反映中，我们能够感受到做教师的快乐。另外，“教研相长”又是一个需要长期坚持和努力的过程，在目前这样的环境中也是需要比别人付出更多心血的过程。过程之漫长并不可怕，好在这个过程是快乐的。

时值2016年教师节即将来临，新的学期也将开始，愿以“教研相长七书”以为纪念，期望读者诸位多加指教。

“教研相长七书”整理、编排过程中，马维强同志付出了辛勤的劳动，特以致谢。

行 龙

2016年8月29日

于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前 言

《山西区域社会史十五讲》，以我近年来在教学过程中撰写的十五篇论文汇集而成。可以说，它是在课堂讲稿的基础上撰写而成的学术论文，也是长期以来“教研相长”的成果。这些论文的初稿都在山西大学本科或研究生的相关课程中“初次亮相”，其中也有几篇曾在省内的各种干部学习或学术论坛做过演讲，进而吸收了多方意见，最后修订成文。

自1998年师从戴逸先生取得博士学位回到山西大学以来，我的学术兴趣主要集中在区域社会史，而这个区域就是“生于斯、长于斯”的三晋大地。我在一篇论文中曾经这样写道：“‘区域’可大可小，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开展区域社会史研究，研究者可以选择自己熟悉的‘生于斯、长于斯’的相对区域开展研究。这样既有天时、地利、人和的基本条件，又有切身体会和领悟的实践”（行龙：《再论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山西明清社会史研究》，载《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4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基本的学术认知，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我已撰写发表有关山西区域社会史的论文数十篇。这里选出的十五篇，主要是从区域社会史的整体关照“入眼”，同时考虑到大学生和研究生选择这门课程的学术兴趣。

本书十五篇文章分为六部分内容。

第一部分三篇文章。开篇论述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涉及各家提出的相关理论；在方法上应当注意的三个问题；山西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四个领域。第二篇实为山西区域社会史的一个概要，当然也有自己的认识融入其中。第三篇是特别从“竹枝词”这种不为人们重视的体裁中，多方面地去看山西社会。概言之，一辑意在从整体上把握山西区域社会史。

第二部分讲山西的水资源问题，算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山西之长在于煤，山西之短在于水”。资源是区域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人口、资源、环境相互依存又相互作用。本辑三篇论文，一篇讲山西的母亲河——汾河的水资源变迁，两篇讲晋水流域的环境与灾害。以晋水流域为个案，从人口、资源、环境的角度探讨区域社会内部的各种相互关系，对于进一步认识山西历史与现实，都有典型的意义。

第三部分以史料发掘立意，以传统意义上不为史家重视的秧歌剧本和图像为基本资料，解读晋商和抗日根据地社会的方方面面。社会史不仅在理论和方法上对传统史学提出挑战，在史料的利用上也是一个扩展和深入。年鉴学派呼吁社会史研究者来一场“史料革命”，我们也认为“什么都可以成为区域社会史研究的资料”。扩展社会史研究的资料范围，对学生而言也是一种方法论上的启发。

第四部分三篇文章倡导并实践“走向田野与社会”的理念。社会史的研究既要走向田野，也要走向社会。走向田野，直接到那个具体的区域中去体验空间的历史，观察研究对象的日常，感受历史现场的氛围，才能对区域社会的历史有更为深刻的把握。走向社会，就是要关注现实社会，研究区域社会的历史，现实社会是一个重要的参照。四辑三篇文章中，一为倡导开展以历史学为本位的田野社会调查工作；二为倡导开展集体化时代的中国农村社会研究；三是对一个普通村庄进行田野调查的札记。

第五部分是关于两个人物的研究。传统史学叫作“人物传记”，现在时髦的叫法是“个体生命史”，这里突出的是将人物研究融入社会历史发展变迁脉络中，由个体的历史反映整体的历史。刘大鹏是清末民初内地乡村的一位普通文人，也是“新时代里的旧文人”。李顺达是家喻户晓的“劳动模范”，也是一位普通贫苦农民的代表。他们的生活经历和心路历程反映了他们所处的那个特定历史时代。

第六部分是关于山西大学校史的两篇文章。“三题”为：校庆日的考订，译书院及译书考，新共和学会及《新共和》，对山西大学这所百年老校初期的三个问题做了一点小小的考证。另一篇是描述抗日战争中的山西大学，烽火连天中弦歌不辍，那是一个值得怀念的时代。又，校史对学生的教育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为了适应课堂讲授，本书各篇都进行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各节原来没有小标题者，这次统一增加了小标题，特以说明。

坊间流行的“十讲”“十五讲”及其他课堂讲录书籍已有不少，其中多有可资借鉴者。“竿木随身，逢场作戏”，适“教研相长七书”出版之际，应各位同仁之雅意，我也辑出这样一本《山西区域社会史十五讲》，希望在校诸生并读者诸君多多指教。

目 录

前言	(1)
再论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1)
山西何以失去曾经的重要地位	(18)
竹枝词里的三晋社会	(33)
汾河清 山西盛	(58)
晋水流域 36 村水利祭祀系统个案研究	(70)
明清以来晋水流域的环境与灾害	
——以“峪水为灾”为中心的田野考察与研究	(91)
秧歌里的世界	
——兼论晋商与晋中社会	(114)
图像历史:以《晋察冀画报》为中心的视觉解读	(132)
走向田野与社会	
——开展以历史学为本位的田野社会调查工作	(165)
从社会史角度研究集体化时代的中国农村社会	(175)
追寻集体化	
——剪子湾村田野调查札记	(190)
怀才不遇:内地乡绅刘大鹏的生活轨迹	(204)
在村庄与国家之间	
——劳模李顺达的个人生活史	(226)
山西大学校史三题	(249)
抗战中的山西大学	(260)

再论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深入发展需要理论提升和方法创新。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笔者与乔志强先生曾联名撰文就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问题做过初步探讨。在该文中，我们就区域社会史的概念、范畴、必要性、地域划分标准、具体研究内容，以及方法论方面的问题作了初步阐述。与此同时，国内外学界同行也是见仁见智，纷纷就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各抒己见。近些年来，在我们对山西区域社会史的研究实践中，对开展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问题又有了新体悟。为此，笔者不揣浅陋，愿就此再做申论。

一 区域社会史渐成“宠儿”

区域社会史研究已引起国内外中国史学者的广泛重视。以区域社会作为研究对象的论著在绝对数量持续增长的基础上，一批以资料、理论与方法见长、代表学术前沿且具有广泛影响的成果，更为区域社会史研究锦上添花。年鉴派学人重视区域史研究的传统早已为学界熟知，毋庸多论。国内近年来的学术研究亦显示了同样明确的学术追求。在杨念群主编的《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中，入选的所有文章几无一例是脱离开区域社会进行研究的。实践表明：区域社会史的研究正是顺应了这样一种学术追求而成为时代的“宠儿”。在当前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中，专注于区域社会史的方向是完全符合学术发展规律的正确选择。

国外著名的汉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们在各自对中国社会的研究中也提出了具有较大影响的理论模式。众所周知的施坚雅的“区域系

统分析”理论、萧公权的“士绅社会”理论、柯文的“中国中心观”理论、黄宗智的“过密化”理论、哈贝马斯的“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理论、杜赞奇的“权力的文化网络”及乡村基层政权“内卷化”研究、艾尔曼的“文化资本”解释方法等，不但成为国内史学研究者在研究中国社会史时的重要参照，而且成为具有重大学术影响的理论框架。值得注意的是，学者们的上述理论无一不用于区域社会研究。黄宗智的“过密化”理论和杜赞奇的“权力的文化网络”理论均是在研究华北地区乡村社会时提出的；施坚雅的“区域系统分析”理论和罗威廉的“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则是建基于各自有关中国某个中心城市及其市镇的研究。这些都是在区域性研究中经过检验证明的有效理论建构。海外学者构建的这些理论模式受到中国社会史学界青睐的同时，也引起从事实证性研究学者的质疑与辩驳，产生了对上述理论进行修正、批驳的现象。尽管如此，这些被称为“中层理论”的“理论”在目前国内的社会史尤其是区域社会史研究中，仍发挥着主导和积极的作用，成为从事社会史研究的学者应当认真加以审视和讨论的问题。

国内部分中青年学者在区域史研究中，针对上述理论，纷纷建构出各自“本土化”的理论模式或解释体系^①，如秦晖的“关中模式”、方慧容的“无事件境”、杨念群的“医疗空间转换模式”以及陈春声对神庙系统与信仰空间互动关系的研究，为我们开展区域社会史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和参照。诚如杨念群所概括的“这些文章在运用西方社会理论的程度有所不同，却大多通过修正与反思的途径，力图设问出个性化的中国式问题，并力图实现其本土化的转换。这些设问有的可能较为成功，有的难免仍有照搬套用的痕迹，不过我们仍会从中看出中国社会史研究迈向本土化的前景之所在”^②。在吸收借鉴国内外优秀成果的同时，近年来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也把山西区域社会史作为研究重点，《近代山西社会研究——走向田野与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年 2

① 尽管有些学者并不是将自己的研究限制在区域社会史的范围内，但事实上却体现出了这样一种客观的情形。

② 杨念群：《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31 页。

月版),就是我们在此方面努力探索的初步成果。

在国内外有关区域社会史研究理论方法的影响下,国内学界在社会史的纵深研究方面取得了具有创新意义的成就,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即国家与社会、思想与社会、法律与社会。

以“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研究而论,不仅出现了大量由社会学者完成的相关理论著述,如张静的《国家与社会》、邓正来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等,而且在历史学者们进行的区域社会研究中,以个案研究方式寻求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作用下的不同地域社会运行变迁模式已引起国内外学界的高度重视。如英国学者科大卫与中山大学刘志伟教授的长期合作中,他们以华南宗族与地方社会为研究对象,讨论了宗族意识形态通过何种渠道向地方社会扩张和渗透,宗族礼仪如何在地方社会推广,把地方认同与国家象征结合起来的进程。^① 他们的研究侧重于从民间社会的立场出发,观察国家传统与民间传统的相互作用关系,注重仪式、符号的象征意义和实际效果,体现了社会史研究自下而上的方法论特征,已逐渐取得越来越多社会史研究者的赞同。

在“思想与社会”研究方面,葛兆光反对将思想史变成“思想家的博物馆”,旗帜鲜明地提出:“过去的思想史只是思想家的思想史或经典的思想史,可是我们应当注意到在人们生活的实际的世界中,还有一种近乎平均值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作为底色或基石而存在,这种一般的知识、思想与信仰真正地在人们判断、解释、处理面前世界中起着作用,因此,似乎在精英和经典的思想与普通的社会和生活之间,还有一个‘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② 与之相应。罗志田通过对清末至民国年间山西省太原县赤桥村乡绅刘大鹏个人经历和心路历程的分析,探讨了一名内地乡绅眼中的近代社会变迁,为思想与社会关系的研究又提供了一个绝好的例证。^③ 两位学者的共同点均在于关注民间、关注地方社会,在尊重和理解大传统的同时,更侧重于关怀小传统的形成和影响。

① [英] 科大卫、刘志伟:《宗族与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明清华南地区宗族发展的意识形态基础》,《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

②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页。

③ 罗志田:《科举制的废除与四民社会的解体——一个内地乡绅眼中的近代社会变迁》,台湾《清华学报》(新竹)新25卷4期(1995年12月)。

虽然葛著中也解释说“所谓‘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历史’描述的并不完全是‘小传统’”，并希望读者不要用“大传统”与“小传统”这两个二元对立的词语来划分思想史的叙述对象，也不要将所谓的“民间思想”或“民众思想”来等同于他所说的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但是，站在区域的立场观察地方社会的发展变迁状况时，重视“小传统”的因素、重视民众思想和民间的风俗文化不失为深化区域社会史研究的重要方法和切入点。

对“法律与社会”问题的关注始自瞿同祖先生。作为一名拓荒者，他在早年撰写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著作中，首先提出法律与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的密切关系，主张应将法律与社会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书中涉及家族、婚姻、巫术及宗教等方面的内容。沿至今日，在国家与社会、大传统与小传统等理论模式的影响下，此一方面的研究又取得了更新进展。如梁治平采取法律社会学视角，依据清代官府档案、民间契约和民国初期的司法调查等一手材料，对不同于国家法的另一种知识传统——清代习惯法进行了系统探究，其研究重点已由国家法转向民间法，从“大传统”转向“小传统”。同样，美国学者黄宗智在清代民事法律制度的研究中，亦抱着同样的问题关怀，提出了“第三领域”的观点，认为应当超越“国家/社会”的二元模式，采用“国家/第三领域/社会”的三元模式。^①虽然其试图超越“国家/社会”的二元模式，仍未跳出该理论模式的桎梏，但此类研究成果说明国家与社会关系这一分析框架对于中国的社会史研究仍然具有强大的理论指导意义。

不难发现，不论是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探讨，还是思想史的编撰者考虑在历史过程中实际起主导作用的精英与非精英的思想演进进程，甚至从法律与社会的关系入手对历史上的社会进行重新剖析，均向我们展现了传统民间社会、民众力量、民间文化习俗的基本状况和发展变迁特点，反映了一种突破以往只注重精英、上层、政治，忽略下层民众的学院式研究局限的学术关怀，此种研究不但极大地拓宽了史学研究的领域，而且丰富了史学研究的内容，使“一切历史都是社会史”的观点在当前

^① 参见黄宗智《民事审判与民间调解：清代的表达与实践》，刘昶、李怀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学术发展大背景下变得愈加令人信服。

那么，如何更好地开展区域社会史研究呢？我们认为，今后的区域社会史研究中，在理论方法上更应关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应重视“大传统与小传统”关系理论在区域社会史研究中的运用。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在对墨西哥乡村地区进行研究时，开创性地使用大传统（Great Tradition）与小传统（Little Tradition）的二元分析框架，并于1956年出版了《农民社会与文化》，首次提出大传统与小传统这一对概念，用以说明在复杂社会中存在两个不同层次的文化传统。所谓大传统一般是指一个社会里上层的贵族、士绅、知识分子所代表的主流文化或者社会中的上层精英文化；而所谓的小传统是指一般社会大众，特别是乡民或俗民所代表的生活文化。此外，他还将大小传统分别称为“高文化”“低文化”及“学者文化”“通俗文化”等。但他的分析过于强调二者的差异性分层，将其置于两个对立的文化层面，认为小传统在文化系统中处于被动地位，使得在文明农村的发展中，不可避免地被城市“吞食”与“同化”。

中国传统乡村社会长期存在并延续的丰富文化现象与大量的“地方性知识”，均可纳入“小传统”的研究范畴。这些“小传统”虽然没有得到国家的正式认可，却已深深扎根于民众心灵深处，成为影响民众行为规范、价值评判、生活方式乃至乡村社会结构与制度变迁的主要因素。区域社会史研究就是要从区域的整体出发，将这些长期以来被忽视的、在广大行政县区、市镇和村落具有明显地域风格与差别的文化习俗、惯例规约和民众信仰等问题加以系统研究。以往学者们经常运用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去解释类似复杂的文化现象，尽管颇为有效，却也经常碰到很多该理论解释不清或无法解释的问题。将人类学的大传统与小传统理论引入我们的研究中，恰恰弥补了这方面的缺憾。人类学者庄孔韶提出，在社区研究中运用“反观法”，在宏观国家社会变迁史的框架下对社区及外部力量做历史的探讨，了解大小传统在互动过程中的变异、协调和互补，使以“小地方”论“大社会”的人类学方法体现出优越性^①，正是

^① 参阅庄孔韶《银翅——中国的地方社会与文化变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